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災難、共同體與文化國家的走向：有關日本大地震的思考

Disaster, Community and the Cultural N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3/11
Tohoku Earthquake in Japan

doi:10.6752/JCS.201206_(14).0017

文化研究, (14), 2012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4), 2012

作者/Author：趙京華(Jing-Hua Zhao)

頁數/Page：408-41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6_\(14\).0017](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6_(14).001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災難、共同體與文化國家的走向： 有關日本大地震的思考

Disaster, Community and the Cultural N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3/11 Tohoku Earthquake in Japan

趙京華

Jing-Hua Zhao

一、前言

向來以多元視角關注當下文化問題並做縱深之學理剖析而著稱的《文化研究》，這次計畫刊出日本震災專題論壇，這對關心日本及其東亞區域歷史與未來走向的人們來說，無疑是令人敬佩和心懷感激的。因為，3/11大地震所引發的問題複雜萬端，決不僅僅屬於日本。其中，既有人類如何面對自然災害的課題，也有核輻射所引發的核時代之危機（人禍），這又涉及到地緣政治乃至現行資本主義世界的一些結構性問題，足以作為我們長久省察的思想課題。本文將主要就自然災害暴露出管理社會的結構性危機、新型共同體的建構問題，以及震後日本國家走向對東亞地區的可能影響等，陳述個人的一些感受和見解。

* 聲明：本論壇刊載的文章，是各執筆者在去年12月11日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所主辦「災難、國族、影像：東亞跨國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的基础上撰寫的。大陸與日本的學者此次能夠針對同一主題在台灣刊行的學術雜誌上共同發表稿件，也是本次研討會的重要成果之一。謹在此向企劃並成功舉辦了研討會，之後又為讓我們的文章能夠在台灣發表而付出心血的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的黃錦容教授表示由衷的謝忱。——大塚英志、趙京華、秦剛。

二、管理社會的結構性問題

回顧一年前東日本大地震，那一幕幕驚恐的畫面依然歷歷在目。地震徹底震驚了世界！面對大片被黑色的海嘯波濤夷為平地的漁村和沿海城鎮，9級震度下超過2萬人以上的人員死亡或失蹤，以及福島第一核電廠全面受毀核輻射洩漏危機千鈞一髮的局面，我們觸目驚心錯愕不已，深感在巨大而突如其來的自然力面前人類的脆弱無奈。如今，我不斷在腦海裡重播3月11日下午2點46分以來一個個緊迫驚險的電視畫面，感觸深刻且時時在思考的首先是這樣一個問題：日本這樣高度制度化的科層管理社會卻在大震災處理上一再出現應對不力而措手不及的現象，其問題究竟何在？

大概是在1980年代前後，日本經歷了20餘年戰後復甦和經濟快速成長而漸次進入高度精密的現代科層管理社會。資本理性化的管理社會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盡可能排除人爲、偶然、不確定的因素乃至政治運作，社會的運轉被嚴密地置於一整套制度安排和規範系統之下。在社會常態運行的時候，這個管理系統會發揮理性、科學的最大化功效，使一切按部就班朝著既定的目標行進。然而，當面臨巨大而無法預測的天災人禍時，這個管理系統往往會陷入癱瘓或應對不力的局面。人類建構起來的管理社會一旦發展完善起來，也會反過來削弱甚至遏制人類自身本來具有的應變能力。這是否也是一種馬克思所謂的人之自我異化現象呢？我們且看，地震海嘯發生之後，人們發現福島第一核電廠大面積被毀而陷於停止運轉的狀態，乏燃料棒無法正常冷卻甚至在次日引起了3號機組等的相繼爆炸。當在核電廠正門和上空檢測出大量核輻射之際，所屬的東京電力公司驚慌失措且有意掩蓋事實真相，沒有在第一時間實施注水行動，致使機組報廢。結集而來救災的消防廳、警視廳乃至自衛隊的人員亦無發靠近現場。

在此，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全作業的規則規定，人員不能在超過100毫西弗的輻射狀態下作業。這使日本在全世界衆目睽睽之下錯失搶救的第一時間。後來，日本政府不得已臨時改變了這條規定而放寬限制爲250毫西弗，注水的措施才漸漸奏效。另一方面，東京電力

公司的隱瞞事實和事故搶救不力受到日本社會的廣泛批評，菅直人政府不得不在地震發生4天之後接管事故處理的權責，並遲至3月16日才發出緊急事態宣言，展開陸空兩路的大搶救。一個國家的核事故危機管理本來就不應該交給民間公司承擔，日本政府這一系列事後舉措雖有亡羊補牢之效，卻也深刻反映出高度發達的管理社會其應對不可測災難時的弊端，它甚至造成無法迅速及時地實施防災避難的後果。我想，這絕非僅僅是日本一個國家的問題。

現代科層管理社會的系統運作，其合理和有效的強大能力在於系統設計的可預測性。然而，這同時也是它最脆弱的地方。就是說，當遇到無法預測的天災人禍，或者面臨事先沒有編入預設程式的突發事件，則這個管理社會的系統運作將立刻陷於癱瘓。東日本大地震再次提醒人們注意：人類不能過分迷信和依賴管理社會的系統運作，必須看到它的局限性，並重新認識人類本身千百年來在適應大自然過程中所造就的應變能力。

另一方面，日本是一個整個坐落在地震帶和火山之上的島嶼國家，國民自然不缺乏防災避難的意識和訓練，甚至歷來習慣了以欣賞速謝的櫻花來涵養隨時接受自然災變的心性。然而，這次地震和核輻射洩漏的確史無前例。地震發生6天之後，日本政府宣佈此乃戰後遭遇的最大自然災害，在將福島核電廠事故的等級調高為5級的同時，甚至強調要考慮到東日本全毀的最後惡果，言下之意日本正面臨著國家生死存亡的危機。而據美國高盛公司當時的評估，這次地震損失將達兩千億美元，災後重建則至少首先需要投入十億美元。如今一年的時間已經過去，面對史無前例的浩劫，人們還無法預估這場大難將對日本社會造成怎樣深刻的影響和改變，而重建家園的復興之路至少要10年或20年的功夫，則是毫無疑問的。

與東京電力公司對應核事故的糟糕姿態相反，我們看到有50名「留守勇士」默默地自願在核電廠裡面承擔事故處理的工作。而且，當我們事後知道他們的大部分其實並非東電公司的正式職工而是臨時合同工的時候，崇敬之情進一步加深。還有，在人們批評日本政府與東京電力公司一道有隱瞞資訊之虞和應對不夠及時得力的同時，我們

卻發現普通百姓的刻苦忍耐與相互扶救、以及地震災區的井然有序。沒有趁火打劫、你爭我奪和哄抬物價，有的是在商店裡、電話亭旁邊排起的長長行列，這同樣是令世界震驚的畫面。我想，依靠這樣的國民，日本災後的復興應該不成問題。同時，它也進一步促使我們去思考共同體如何建構乃至國家未來發展等深層問題。

三、新型共同體的建構

地震發生後不久曾有人估計，災後的重建和復興說不定還能推動日本經濟的復蘇。不過，看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後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振興經濟的效果，我個人對此並不樂觀。從一年來災後復興的乏力來看，甚至讓人預感到日本經濟真正進入了長久的衰退期，這一點將在後面詳述。然而，在地震發生後跟東京的一位日本朋友電話交談中，我卻有了另外的感受。那位朋友感慨道，如果災後的重建和復興能夠喚起日本國民相互扶助、彼此幫襯的協調精神，改變這些年來經濟蕭條政治低迷所造成的壓抑心理，給社會帶來新生和活力，那麼這場災難或許會產生另一種積極的意義。

是的，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始終未能走出經濟蕭條的陰影，政治外交保守無力而不盡人意，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造成新一輪貧富差距的加大，而政治家卻聲言要每個國民個人負責。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整體上瀰漫著黯淡壓抑的氣氛，極端個人主義大有蔓延的趨勢。日本傳統的集團意識和家族式的友愛互助精神受到挫傷，加之高度發達的科層管理社會的控制，致使整個社會封閉而缺乏活力。這恐怕是當今日本最大的問題所在。而大地震之後，也確實出現了民間自發的相互扶助、彼此幫襯的感人景觀。因此，我完全同意東京那位朋友的想法，也期待著日本人民以大震災為契機，重新創造出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和美好的明天。至於經濟上能否再創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業績並續寫輝煌，我看並不特別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應當以大地震為契機去思考如何維持或者重建一個不同以往的共同體。

如果可以將地震之後東京那位朋友所期待的社會狀態和人際關係稱之為「災難共同體」的出現，那麼，它的確展現了一種日常難以見到的人與人之間「兄弟般共同承擔」的關係。震災發生不久，我們看到有許許多多年輕的義工從日本各地趕赴地震現場，留下了相互扶助、無私奉獻的感人故事；無數的人們捐獻錢財和物品以幫助災區的賑災和重建，平常建立在資本的邏輯之上的商品交換關係似乎一時消失了。然而，我們也應當承認這種「災難共同體」不可能長久存在，事實上也是如此。麗蓓嘉·索妮特(Rebecca Solnit)在《災難烏托邦》(*A Paradise Built in Hell*)一書中曾指出，自然「災難過程」中產生的是一種「特殊的共同體」。這樣的共同體不可能維持多久。在這次日本地震和一年來的賑災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一時的相互扶助高潮過去之後，就出現了對地震災區農產品的「謠傳受害」（傳說其農產品有核輻射殘留而拒買），甚至發生了惡用國家賑災和社會賠償制度而騙取錢財的事件。日常現實中那個無孔不入的「資本的邏輯」又捲土重來了。

一般情況下，人們相信當秩序消失之際會出現霍布斯所謂人人是一匹狼那樣的自然狀態，因而國家的存在將成為必要。但實際上，那些在國家秩序下互相恐懼的人們，在災難的無秩序狀態中卻可以創造出與國家秩序不同的自然生長的秩序和相互扶助的共同體。我認為，在思考日本大地震後共同體如何維持和重建時，這一點最值得關注。就是說，相互扶助的「災難共同體」雖然不能維持長久，但其中突然閃現出來的古老而又彌新的「兄弟般共同承擔」的人際關係，將成為我們反思以資本的邏輯和國家「理性」為根本的現代社會中其共同體問題的批判性參照。當然，正如鮑曼(Zygmunt Bauman)所指出的那樣，傳統共同體是一個「溫馨的地方」，它可以給你提供確定性和安全感，但同時你也要付出代價——你的自由或者「成為自我的權利」。(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 2001)我們並非要簡單地回到傳統的共同體，也不是希望「災難共同體」能夠固定下來並維持長久，實際上這也無法做到。而是要把那難得一見的相互扶助、彼此幫襯的人際關係，那種自然生長的「兄弟般共同承擔」的道德精神接續下來，去尋找和建構既保證個人自由不受挫折又能抑制自私自利之無限膨脹的新型共同體。

四、文化國家的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人們對共同體乃至民族國家多有反省和批判。這讓我們認識到傳統共同體的封閉性和排斥他者的性格。而從傳統共同體演變而來的現代主權國家，就其針對其他國家的存在而存在或以國家間的「敵意」為前提這一點來看，它依然沒有消除原有共同體的封閉性和排他性。如上所述，「災難共同體」的相互扶助和「兄弟般共同承擔」的精神可以為今天的我們所用，這並不意味著要回到傳統共同體本身。有關國家的問題，也是一樣。3/11日本大地震後一年多的社會恢復和經濟重振舉步維艱，有人甚至指出災後復興的漫長跋涉才剛剛踏出門檻。在如此巨大的自然災害過去之後，作為我們的鄰國和東亞區域重要成員的日本，在未來10年20年中會成為怎樣一個國家，這是我在不斷思考的另一個問題。

自然災害突如其來而不可預測，但災害給社會造成的衝擊及未來發展走向卻可以在以往的歷史中找到線索。回顧近代日本150年來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這個國家曾以兩種面貌或性格顯露於世人的面前，一個是作為後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經過明治維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迅速躋身於霸權國家的行列，並在1930年代世界政治秩序發生重大重組的過程中成為深深介入其中的帝國主義一極。就是說，直到1945年戰敗，日本在世人面前是一個咄咄逼人的新興政治國家。政治國家，不僅意味著主權的完全獨立自主，還包括有強大的經濟軍事力量作為支撐，可以在國際事務中依據自己的政治道德邏輯行事。另一個是作為二戰戰敗國，經歷了主權遭到剝奪的被占領時期而於1950年代後期迅速崛起，並成為強大的經濟國家。這個經濟國家或經濟強國的形象，一直維持到1980年代結束。此間，日本在因美日安保協定而國家主權受到限制的情況下，艱苦奮鬥努力實現經濟上的戰後復興，短短20年間不僅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戰前以帝國主義和殖民侵略方式沒能實現的勢力擴張，卻在戰後的經濟發展和亞洲經援外交推動下得於手中。可以說，作為亞洲乃至世界的經濟強國，日本的霸權地位雖於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衰退，但真正被取代乃

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際。

那麼，在政治國家和經濟國家之後，日本會以什麼面目出現於世人面前呢？大震災之後的復興將會再造一個怎樣的日本？它會不會在未來以「文化國家」的面貌重新回到亞洲區域中來？

在東日本大地震一周年之際，作家高村薰回顧起來依然感到面對如此巨大的震災而深感失語的痛苦，同時，她強調災後復興應該是怎樣一種「復興」則誰也說不清楚（2012/3/9，NHK訪談）。的確，觀察一年來的災後復興歷程，給我留下的一個深刻印象是日本國家主導的災後重建嚴重滯後。據2012年3月5日NHK公布的民調結果，有81%的民衆對復興的進度感到不滿，認為國家的舉措過於緩慢，更不必說規劃出一個未來社會的理想藍圖了。這與高村薰的感受完全一致。這種情況的出現原因可能有種種，比如地震破壞程度巨大而無從著手，核洩漏事故之嚴重前所未有而必須慎重處理，日本東北偏遠地方多是老齡化社區，人手和資本短缺自不必說，政府和民間資本內心裡也不願意把資金大量投放到沒有發展前景的地區。而更根本的原因，在我看來，是經濟國家日本其經濟實力真正衰落了，因而災後復興的力度不夠和進度緩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野田內閣成立後立刻著手制定社會保障和消費稅的一體化改革，甚至出現了削減公務員薪俸的呼聲，也說明經濟實力下滑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另據報導，2011年日本貿易出口逆差達到198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準，這對長期以來堅持貿易立國的這個國家來說無疑意味著經濟衰退已成定局。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時候，日本還有借災後復興以重振經濟雄風的主張而「新自由主義政策」也是從那時開始全面貫徹開來的。然而10幾年過去了，這樣的理想光景沒有出現。而這次與地震同時發生的核事故，更使問題進一步複雜化了。擁有世界上十分之一核電廠的日本，其核能利用乃是該國經濟產業的重要根基，而在國民普遍反對的情況下，若走上完全廢除核能的道路，其能源短缺將給實體經濟造成的影響，更可想而知。

千頭萬緒歸結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上來：日本這個國家未來將如何發展變化？我認為有一種可能性，即建設文化國家並通過重返亞洲

以實現自身的再造。我們觀察歷史上的霸權國家如18世紀的荷蘭和19世紀的英國，它們在失去政治經濟上的優勢之後，依然可以實現文化上的成熟發展並以此自立於世界之林，成為擁有文化軟實力而影響地區和世界的重要國家。在政治國家和經濟強國的日本已經成為歷史的今天，震災後的重建將朝文化國家的方向發展，自然是一種可能性。實際上，日本不僅擁有建構文化國家的民族精神傳統和現代化方面積累的經驗與資源，在國家設計和管理的政治層面也早有政治家於經濟高速發展的1970年代後期提出過文化國家的理念。

例如，在1970年代日美貿易磨擦引起文化差異論爭的背景下，來自美國和西歐的日本文化特殊論以及對其社會體系之封閉性的批判，使日本人自身意識到了「文化」問題的重要性。1978年出任首相的大平正芳或許是真正認識到文化國家軟實力的一位重要領導人。他不斷強調「文化時代」已然到來，認為「把世界視為一個共同體來把握，確認日本對於世界的使命和責任」十分重要，因此，需要自身的文化建設。國際關係史學者入江昭指出：1970年代的日本國家開始意識到文化這一新的方面，雖然在如何定位並具體實施其文化國家建設的方面還缺乏明確的思想基礎，但至少當時的領導人確實強烈地意識到了國際社會中日本的作用和存在意義的問題，這在戰後還是第一次。當福田康夫首相明確表示「雖有製造核武器的經濟技術能力」但依然要堅持非核三原則、雖為經濟大國但「不走軍事大國的道路」之際，還有，當大平正芳首相面向21世紀宣誓要「增進地球共同體的相互理解」時，的確反映了這種自覺意識。大平正芳強調「需要在充實防衛力量的同時建立集結了經濟、外交、文化創造力的「綜合安全保障體制」。可以說這是針對不斷變化著的世界局勢而做出的明確反應。（入江昭，《新·日本的外交》）如今，這種「文化國家」的理念已經成為日本一部分國民的共識。

五、結語

3/11東日本大地震對包括經濟在內的日本各方面無疑是一次重

創，同時復興過程的舉步維艱也如實反映了其經濟實力的衰退。但另一方面，震災後一時出現的「災難共同體」又表現出日本民族具有厚重的道德情操與文化精神傳統。我們可以相信，如果在戰後確立起來的和平憲法基礎上，充分發揮日本民族注重文化創造、講究道德審美的性格特徵，並將在共同體內部善於相互扶助彼此幫襯的傳統發揚光大，同時把150年來現代化過程中積累下來的經驗和教訓創造性地轉化為建構文化國家的資源，那麼，就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創造一個新的文化日本。

而上面我所說的「重返亞洲以實現自身的再造」，是指日本如果能夠反省和改變明治維新以來崇拜西洋、二戰之後追隨美國而輕視亞洲本地區的一貫態度和作法，重返亞洲並與本地區民衆共同反思和分享現代化的經驗教訓，那麼，就有可能在撫平歷史創傷並達成相互之間真正和解的過程中實現文化國家的再造。這樣一個文化國家日本的出現，同時也需要我們相應地調整以往的對日認識和交往方式。

總之，以上分析與其說是3/11大地震後日本國家必然的發展走向，不如說是我作為一個關心鄰國和東亞地區未來發展的人，對日本的殷切期待。而在主權國家概念日趨淡化和傳統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之行使越來越不受歡迎的21世紀，這種文化國家的再造具有深遠意義，尤其是在美國高調「重返亞洲」有可能給該地區造成新的麻煩的今天，文化國家日本或者對和平共生之區域政治生態的建設將發揮新的作用，亦未可知。